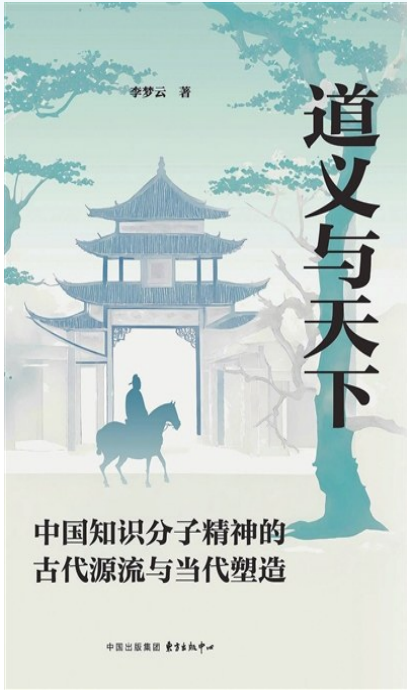


# 论“士志于道”的古今演变



古代是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源流的源头活水,当代则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现实根基,二者共同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承与发展的脉络。无论是追溯古代,还是审视当代,“安身立命”“立国兴邦”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核心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传承文化、示范引领的中坚力量。李梦云教授的《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

与当代塑造》以广阔的历史视角解读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轨迹,从“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持续到“解民于倒悬”的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从“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画像延绵到“勇担道义,兼济天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建构,以“道义”与“天下”为双重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谱系。

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观之,中国思想在历史长河中虽历经变迁,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精神连续性,既传承先辈智慧,又融入时代内涵。通过聚焦“士志于道”这一核心命题,从《论语》中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表述,从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意象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从严复的启蒙思想、李大钊的革命理念到鲁迅的批判精神,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坚守到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理论探索等,无不昭示着“士志于道”绝非僵化的教条,而是传统士人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深刻演绎。

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面临“智能体”“流量至上”“信息茧房”等新挑战。作者并未停留在历史回顾,而是积极回应现实问题,提出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时代坚守批判精神与公共关怀。面对现实困境:从体制化、专业化的结构性约束,到功利化、媚俗化的价值迷失;从“精致利己主义”的蔓延到“躺平”“内

卷”等文化的流行;再到数字媒介革命对知识生产的深刻冲击,作者创造性地从知识分子品质、素养、底色和责任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化路径。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其核心价值并非简单的时代更迭产物,而是在“内圣外王”的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双重维度中,通过不断自我调适而形成的文化基因谱系。作者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系统梳理了这一精神谱系的历史演进脉络,更在于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气质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本书通过建构“担道义忧天下”的分析框架,在历史纵深与当代语境之间建立起多维对话空间,既准确把握了传统价值与 Modernity 之间的内在张力,又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重构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的范式。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文化自信”为精神引领,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国家战略新高度。作者巧妙地将“礼义廉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理念的引述与当代知识分子事迹形成历史对话,使传统智慧获得具象化表达。探究士人精神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的“寻根”之旅,阐释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在当今时代,作者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强调增强文化认同、坚持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的重

要性。这种叙述方式既“接地气”又“上档次”,让优秀中国文化既能“走出去”展现民族风采,又能“走回来”扎根故土民心,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更好地说明了此书的学术实践恰与此形成时代共振。

从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千年回响,到当代知识分子在实验室、讲台等默默耕耘,传统士人精神始终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着价值导航。当我们把书中的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便是在书写新的时代注脚,这种注脚,既连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根系,更通向“为万世开太平”的复兴愿景。当个体的自我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形成“同频共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为人民幸福建功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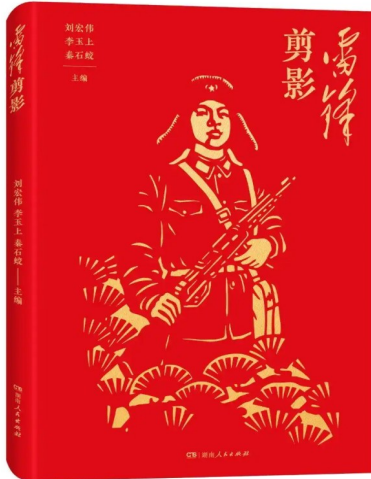
阅读此书,不仅能让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深厚底蕴与悠久传承,更能启发我们在当代如何践行与传承这种精神,在个体成长与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以书中智慧为指引,续写“士志于道”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续写辉煌篇章。

(原载《天津日报》,作者为朱盼娣、肖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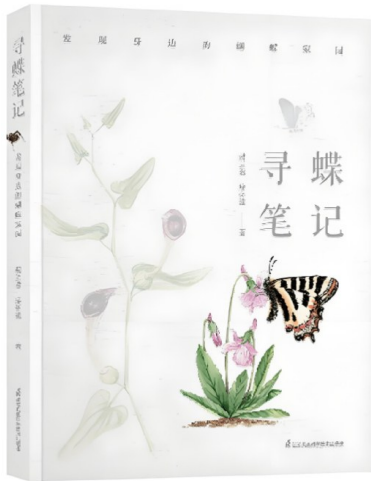
## 新书推介

### 《雷锋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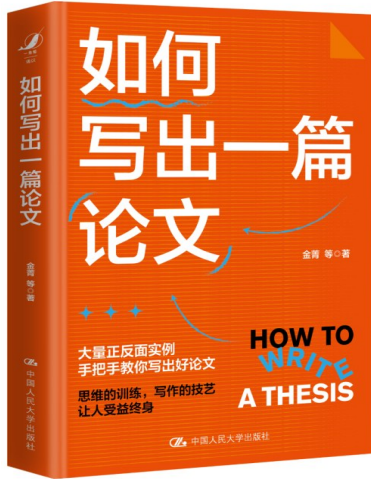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100则感人故事,结合剪纸艺术,生动展现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 《寻蝶笔记:发现身边的蝴蝶家园》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300余幅手绘图画,介绍蝴蝶和植物知识,带读者领略自然之美。

### 《如何写出一篇论文》



内容简介:本书从不同方面来展示具体怎么写出一篇论文,意在帮助读者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基础上形成问题意识和探寻能力。(本报综合)

“小人书”,又称连环画,是一种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通俗读物。

念起童年乐事,最难忘攥着角把几分钱,听钢镚儿在荷包叮当响,颠颠屁颠往镇上跑去,或一头钻进书店,抱走心仪的小人书,让油墨香在指尖漫开;或花一两分钱,久坐小人书摊前,让目光跟随画中人物跌宕。

细细想来,那时的小人书,恰似一位让我认知大千世界的启蒙老师。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流浪记》,让我为旧上海街头那个戴破帽、光脚丫的小男孩揪心,他在寒冬里的颤抖、饥饿中的坚持,让我初懂苦难与坚韧。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金箍棒打得妖魔鬼怪现原形,让我在黑白画页里见识正义力量;三国、水滸中的诸多英雄豪杰,更是吸引着我的眼球,让人为之牵肠挂肚、流连忘返;战争时期的各种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恰如点点繁星,落进

童年的夜空,照亮我们对“英雄”最初的梦想和向往。

上小学后,小人书成了课堂“秘密伙伴”。上课时,我在抽屉里偷看《铁道游击队》,正入神时,被老师发现后没收。放学后去认领,老师说:“这里面的故事很精彩,但得先学好知识和本领,不然以后咋当真正的英雄?”后来,我便学会只在课间看“闲书”。

回家后,书包还没放稳,就急忙掏出从同学那借的《岳飞传》,蜷在堂屋竹床上细细翻阅。母亲喊我烧火,我随口应着,眼不离岳飞跨马提枪;父亲叫我喂鸡,我捧着书到鸡圈旁,对着“岳母刺字”画面出神。母亲说:“你呀,若把这劲头用在学习上,那肯定回回能考一百分……”

如今,我早已为人父,陪伴孩子童年,回想自己童年,恍若隔世。现在的孩子,早已不需要小人书来陪伴了。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彩绘绘本和漫画读本,有的是那些颇具吸引力的动画片,成为他们童年的

最爱。战无不胜的奥特曼、变化多端的变形金刚、勇于冒险的狮子王、机灵可爱的机器猫、精通人性的数码宝贝、勇敢正义的环保卫士熊大熊二,都是他们的最爱。而那些从动画片里衍生出来玩具更是品种多样、五花八门:会讲故事的机器人、能拼大楼的乐高、一按就变形的机甲,代替了我们当年的滚铁环、跳皮筋、踢毽子。

听闻有人专门收藏老版小人书,品相好的2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经典小人书,一套动辄上千甚至数千元。逛古玩市场,见老者蹲在摊位前,小心翻看《林海雪原》,指尖划过书页,眼里泛起柔光。小人书俨然成了收藏品,年轻人嫌画面单调,唯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纸页里的光阴故事。

有一次,偶然翻出一本《三毛流浪记》的小人书,递给儿子,他翻了翻,问道:“爸爸,三毛为什么不穿鞋?”我笑着给他讲三毛卖报、擦鞋的故事,讲到被警察驱赶,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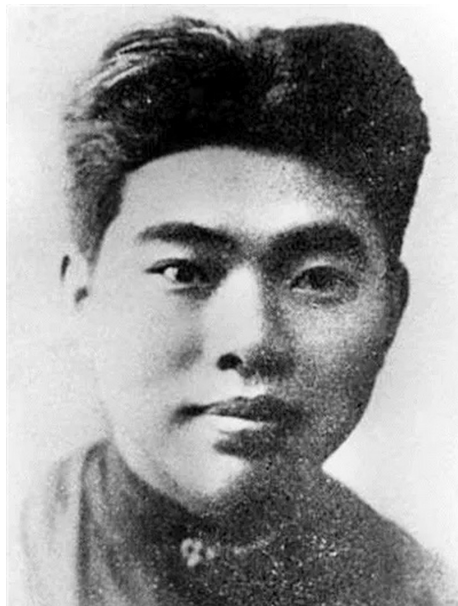
子手抚画面,小声说:“他好可怜啊!”这生动的小人书里的故事,仍能叩开新一代儿童的心扉。

而正街上新华书店的旧址,早已变成时尚商铺。橱窗霓虹下,年轻人边走边刷手机,偶有小孩子路过,手里可能抱着玩具和彩色绘本。我知道,小人书的时代已经远去,如老街上斑驳的砖墙,虽不再是主角,却刻着一代人的童年印记。

每每想起小人书摊前蹲到腿麻的午后,课堂上被没收书时的心跳、捧新书跑回家鞋底扬起的尘土,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温热,那是岁月酿的蜜,甜而不腻,久藏心间。

那曾被师者长辈视为“闲书”的小人书,终将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如一缕温暖的微光,在岁月的长河中闪烁。

## 我的书房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上接第8期)

此时,内地工作队内部也起了变化:副队长盛某和他表兄弟等几人,离队去找他们的老师——CC系头子潘公展安排工作;毛梦觉等几个人也由毛的姑父陈惟中介绍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剩下十来人,由我党一位韩姓同志领导。不久,韩也去延安了,又由钱远铎在上海美专的同学鲁夫领导。至此,只剩五、六人,连生活都成问题。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钱远铎将内地工作队的美专同学王式廓介绍到第三厅搞美术工作。鲁夫也转到云南昆明工作,内地工作队实际上便不存在了。

在领导“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工作中,何功伟曾指导宣传团骨干们学习了许多有关马列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书籍,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艾思奇的《哲学讲话》、陈唯实的《革命哲学》、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华岗的《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以及苏联的小说《母亲》《铁流》《夏伯阳》等。其中有许多书在当时是根本买不到的,何功伟都设法给宣传团寄去。这些书籍都作为宣传团的图书资料在内部陈列出来,供大家学习,使青年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有了较大进步,有的后来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1938年1月5日,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正式成立,经董必武同孔庚等商定,孔庚任主席(常务干事),获得国民政府军委会第六部核准备案。中共湖北省委又先后派张执一、林达飞、郭佩珊等共产党员到乡促会工作,同爱国人士邓初民、黄松龄等合作,通过各种渠道与全省60多个县建立联系,在许多县市区建立分会,至1938年8月,会员发展到5000余人,成为湖北广大乡村中影响较大的群众抗日救国团体。在乡促会工作期间,何功伟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起草乡促会的宣言、章程,创办刊物《战时乡村》。其中,何功伟亲自起草的《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宣言》指出乡促会主要任务是:“促进乡村自卫组织,普及军训,武装民众,以保卫地方,补充正规军队,准备游击战争……”宣言中还明确指出,要以乡村力量控制都市和游击队,协助正规军。这份宣言是何功伟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指导原则,结合当时湖北抗战的形势,以及湖北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写的一篇佳作。它对于指导湖北的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8年2月,何功伟派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团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董凌云

和团员张勋(甘柏)等到咸宁抗战动员委员会工作。4月初,何功伟将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宣传部长方堃调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农村服务队”任队长,兼服务队党支部书记,服务队主要任务是帮助地方开展组织建设,准备游击战争。何功伟要求方堃必须在服务队中开展一次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明白工作的危险性,教育同志们危难时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何功伟除了送给方堃等人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培养革命情操的书籍外,还专门为他们起草了一个《气节教育提纲》。在《提纲》中重点强调:“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被捕,也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要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法庭在监狱中坚持斗争,像先烈那样气势磅礴……”此外,何功伟还一再提醒方堃:“无论是对党员和非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想取得实效,首先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你们到鄂南建党,发展党员,也是如此。”

5月初,方堃带队到了咸宁。临行前,何功伟告诉方堃,他就是咸宁县的人,在当地有一些统战关系,党的组织方面,曾派董凌云等共产党员到“咸宁县抗战动员委员会”工作,并且建立了地方党支部,董走后由许鸾修负责。何功伟让方堃到咸宁后,将农村服务队与咸宁抗战动员委员会合并,以便合法地开展工作。同时就咸宁工作对方堃作具体安排:一、把服务队党支部与咸宁地方党支部合并,成立中共咸宁县工委,由方堃任书记,许鸾修任组织委员,韦君文任宣传委员;二、工委要把发展党员和建立游击武装结合起来抓,重点应放在农村。

何功伟还告诉方堃:咸宁具有光荣的历

史,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十年内战时期又是老苏区,汀泗桥、挂榜山一带,是军事要地,你们在咸宁站稳脚跟后,应尽快开展工作,争取早日打开局面,建立正式的中心县委,以便发动和组织鄂南地区的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方堃等人一到咸宁,立即按照何功伟同志的安排开展工作,将服务队和“抗敌动员委员会”合并,同时将服务队的党支部与咸宁地方党支部合并,建立了中共咸宁县工委,在全县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5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何功伟到任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像一个工人一样,不仅是穿衣,在感情、生活上也与工人打成一片,同时又具备了一定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使区委工作面貌很快有了很大改进。在何功伟领导下,工人运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逐步展开:一、通过各种线索联系一些积极分子并注意从工人中发展党员;二、派党员到工人的群众组织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工人夜校、读书会、工人歌咏队等等;三、根据工人的切身要求,根据群众基础的情况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在何功伟领导区委期间,完成了三项重要任务:一是恢复和重建武昌的党组织,在工人、学生、教师、妇女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16个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150多人,其中工人党员81人,武昌青年救国团发展到数百人;二是在武汉失陷前,把党与群众的骨干有序地组织了几股,部分留在武汉附近或沦陷区打游击,部分输送(先后有几百学生、工人)到延安培养,部分利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地区或敌占区进行群众工作与地下斗争;三是在群众中大力宣传了党的

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的假抗日的真相,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何功伟为武昌地区党的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鄂南开路作先锋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举行扩大会议,何功伟等15人被选为省党委委员。会后省委向全省各地增派干部,以加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根据省委决定,中共鄂中中心县委改组为中共鄂中特委,先后由刘青、何功伟、杨学诚任书记。

7月初,省委根据中央“动员平汉、陇海线上所有中心城市和鄂豫皖三省留居武汉的大批学生、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家乡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到咸宁。

7月6日,何功伟搭车回到咸宁柏墩,一下汽车,就遇到了族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荫民(即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

这天是咸宁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年会日,雷同等几个人到柏墩汽车站迎接一位从咸宁县来出席年会的社员,想不到竟巧遇到何功伟归来,功国、功济喜出望外地喊着:“功伟哥回来了”。何功伟曾经是领导武汉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鄂南的同学都知道他。何功伟还曾组织大家成立球队,每年放假回乡,他都会和同学们讲时事、谈理想,大家都非常钦佩他。

何功国、何功济、雷同和接到的社员,簇拥着何功伟离开车站,穿过参天的古柏林,过木桥,步入田间小道,向刘家祠堂走去。一路上,他们关切地向何功伟打听武汉局势。何功伟告诉他们,日寇正长驱直入地沿江西上,武汉处于危急之中。何功伟向他们询问了咸宁的形势和扶摇社的情况,并参加了“扶摇社”的年会。

### 《何功伟烈士传》连载⑨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